

陆征祥晚年的爱国情怀

◎ 陈志雄

[摘要] 晚年入天主教本笃会隐修的陆征祥在祖国生死存亡关头挺身而出,通过著书立说及创办报刊等多种方式,在海外为国效劳,挾伐日本之不义,激励国人奋起抵抗,争取国际同情与物质援助,展现了他的爱国情怀。

[关键词] 陆征祥 爱国 日本侵华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6) 04-0107-05

1927年,时任中国驻瑞士公使的陆征祥脱离宦海,入比利时布鲁日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肋修院修道,从此过着超凡脱俗的生活。陆氏为国外外交耆宿,清末曾任职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馆,后持节荷兰及俄国;民初在北洋政府中屡掌外交,并曾任国务总理及袁记帝制政府之国务卿。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谈判及1919年巴黎和会,陆征祥均为中国政府首席代表。国内史学界对其外交事功较为关注,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对其晚年在比利时的隐修生活则视为消极之举,缺乏系统研究,多以“隐遁”、“避世”、“忏悔”等语一笔带过。事实上,陆征祥虽潜心学道异域,却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局势。在中华民族陷于危难之时,他大声疾呼,号召国人奋起抗日,并著书立说,在海外宣传祖国抗战,展现了他的爱国情怀。其超性爱国主义理念及对中日两国和平共处的憧憬,至今仍具有镜鉴意义,值得我们回顾与反思。

一、以天主教教义评判日本对中国东北之侵占

“九·一八”事变起,东北全境在4个多月内即完全陷于日人铁蹄之下,“满洲国”傀儡政权亦随即成立。面对这场近百年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痛心疾首,举国鼎沸。陆征祥虽然栖迟泰西,面对国难亦未隐忍不言。强邻深侵,国土沦丧,同胞遭殃,激起了他的爱国情愫。他惊呼帝国主义者于世界期望和平最切之时“竟不畏天命,不恤人言,横施其侵略政策,瞻望前途,感叹无极!”由于已届花甲之年,且身体羸弱,他不可能像英勇的战士们那样执起枪杆效死沙场,但备感“唤起世界舆论,共同担任维持和平之不可稍缓”。^{[1](P5)}因为“自东北事变以来,外人难知真相,东邻多方宣传,舆论偏重日本……均以中国将变赤化,盗贼横行,日本为维持远东大局秩序,乃其天职,居然以远东主人翁自夸,令人发指”。^①为使欧美人士易于理解当时中国的情势,昭著公理,暴露强权,陆征祥不顾病痛,毅然提笔,用法文写成 *L'invasion et l'occupation de la Mandchourie jugées à la lumière de la Doctrine Catholique par les écrits du Cardinal Mercier* (《根据梅西爱枢机的著述以天主教教义评判满洲之被侵占》)一书,于巴黎出版(Paris: Les Éditions du Foyer, 1933)。梅西爱枢机^②在欧美基督教界享有盛誉,陆征祥认为其著述中“拥护政府爱国爱民之崇论宏议,无不根据公理正义博爱诸大原则,以昭示强权之不可久持,公理必得最后之战胜,适先得吾心之所欲言,而可以发人类之深省”。他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与1914-1918年间德军占领比利时相提并论,择要宣布梅西爱枢机著述中切合于东北三省国民被压情形而适于实施之精理名言,“为尽余一分公义之职,以效力于爱好国际和平及秩序诸君,亦即效劳于我国家”。^{[1](P6)}

作者简介 陈志雄,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广东 广州, 510610)。

^① 陆征祥致翰卿函底稿,藏于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肋修院陆征祥档案。根据原文内容判断,当为陆征祥致张学良函。按:张学良,字汉卿。

^② Joseph-Désiré Mercier (1851-1926),比利时马林(Malines)总主教区总主教。1914年德军入侵比利时,作为比国精神领袖的梅西爱枢机发布圣诞节牧函《爱国与坚忍》(Patriotisme et Endurance),公开谴责德军暴行,并向比国民众阐述了基督徒徒持之爱国观,号召他们不必服从占领军当局及其威权,而应守土不屈,拥护国王亚尔培一世,同仇敌忾,共同抗击外来侵略。

陆征祥在书中首先回顾了日本侵华的几件新旧案，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二十一条”要求等，揭露了1931年以来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上海、热河等地之种种恶行，并介绍了《李顿报告书》和马丁《日本反对国联》一书的主要内容。他旁征博引，分析了战祸之源以及如何避免战争这两大问题，进而指出爱国“为最高尚之美德”，公民不顾私利服务于国家“为宇宙间最高之理想”。他对于战争并非绝对否定，认为：“战争只用作保持和平必须之方法时，可告无罪。”此即所谓“不为兴战而求和平，然得为和平而作战”。他坚信，如果中国人民能持“宁可牺牲一切，而不愿忍诟受辱”之精神，建树为真理服务、忠于仁义之自信力，则公理必有最后胜利之一日，东北锦绣山河之收复指日可待。梅西爱枢机要求比利时人民不必承认德国人所扶植的傀儡政权，陆征祥借梅氏之言，号召处于日军铁蹄之下的同胞们应以同等态度对待伪“满洲国”，绝不可做亡国奴。

该书出版后，陆征祥以“中国前国务总理、外交总长，现本笃会修士”的身份将其寄赠国际联盟委员国元首、总理、外交部长、上下议院议员以及政界、报界人士，呼吁他们主持正义，维护国际公理，向日本施压，对中国人民施以援手，共谋世界和平。法国、比利时等国报纸纷纷发表评论与介绍，上海《圣教杂志》、江西《民报》、《磐石杂志》亦将其译为中文予以刊载。陆征祥后来重印该书时自述到：“本书写于1933年比国依瑟（Yser）河畔。此河为比国抵止强敌侵入国土之处。余写此书时心灵中遥念我国之依瑟河，祈祝一中国之亚尔培。……一切胜利，何莫非血战抵抗之结果！世未有不饱经痛苦损失而可胜利者。胜利之获得，全系于全国人心团结，集中意志，听命于唯一领袖指导下焉。国难方殷，敢献数言于吾亲爱同胞之前，以期待最后之胜利。”^{〔2〕}（卷宗58）他的言论既博得了欧美基督徒对中国人民抵抗侵略之正义事业的同情与支持，也引起了国内无数仁人志士的共鸣。于右任称他“执事托迹海邦，乃心祖国，以卫道之热忱为东北水深火热之人民伸张公理，亦中央同人之晨钟暮鼓也。敬佩敬佩！”^{〔2〕}（卷宗8）

二、和平至上主义与超性爱国论

以自身外交经历，陆征祥推崇“口舌胜戈矛”之信念。故其虽勉励国人为和平而战，但并未放弃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之努力。儒家文化传统中“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以及基督教文化中的“和平至上主义”，使他坚信只有“和平才是真理，就是说国家建筑在正义之上，国内才能享有秩序。正义是绝对的，仅只有他是人类和大造间，及人和人间各种关系的表示。”^{〔3〕}（P189）他期望中日之间能消弭战争，“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和平共处。为此他于1937年致函日本裕仁天皇，^①指出侵略主义不合时代潮流，不合日本自身利益，冀图唤起天皇之良知，促其改变方针，制止对华战争。

陆征祥在函中表示，“今日满州事变，不独为吾两国切身之灾，世界祸福，将悉以此为导线。”明确指出日本并吞满蒙的计划“有百害而无一利”。他奉劝天皇，“凡谋国者，当顺大势，倒行逆施，必受其殃。侵略政策，乃历史上过去之事，不适于二十世纪。”希望天皇能虑及“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尊重世界人民的和平意愿，阻止战祸发生，而不应“徒容纳少数军阀之偏见，以与新世纪之潮流相抵抗”。他进而指出，近世科学发达，但世人少享科学之福，反多受科学之祸，此非科学之咎，乃在于人类用之不得其道。日本科技发达，制造精良，如果政府能放弃穷兵黩武之野心，用科学于和平之途，与世界各国在科技领域展开竞争，不仅全球各处将成为日货销售市场，而且可以减轻巨额军费预算带给人民的沉重负担。况中日两国“相去最近，又系同文同种之邦”，倘日本能“以和平为怀，遇事提携，感情一好，则中国对入日货，必格外欢迎”，其它国家必不能与日货相竞争。他谴责日本不少人士不识时务，以好大喜功之心，为争城夺地发动战争，杀人盈野。“战端一开，必为空前绝后之巨灾。世界文化，或与俱尽。稍有人心者，而可为此乎。”他奉劝天皇深刻自省，克服私欲，“不弃尧莠，翻然复计，撤回满州戍兵”，如此则“东方一隅，拨云雾而见青天。和平曙光，起于扶桑，映于寰瀛”。

陆征祥虽向天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内心对其制止战祸并未抱多大希望。在他看来，“中日战

^① 笔者在比利时访学期间，于圣安德肋修院陆征祥档案中发现此信，为已发表之各著述所未提及者。原函为中文，约1300字，无标点，亦未署日期，但据函中陆征祥所述“晚年遭鼓盆之痛，遂弃官入道院，朝夕虔诚奉事天主，不复问国家事者，将近十年已”一句，可断定此函写于1937年。

事，早晚难免……早发早了，晚发晚了，终以死中求生，不以幸免求生。死尸如山岭，血流若江河，牺牲愈多，人格愈高，民族存亡，在此一举。”^{[4](P134)}尤其是当他目睹国内友人寄来的照片时，上海及附近地区遭受日军轰炸后房屋倒塌、满墙弹孔、火车翻转、桥梁断裂之惨状，使他无法对邻邦再抱和平幻想。1937年7月日本扩大对华战争后，各宗教领袖纷起行动，助政府共抒国难。10月2日，外交部长王宠惠致电陆征祥：“强邻侵袭，犯我疆土，全国抗战，敌忾同仇。暴行屡施，中外愤慨。各国耶稣教信徒对日已有严词表示，天主教方面如得教廷或教友方面提倡鼓吹，主张正义，并制止日方暴行，曷深庆幸，诸祈酌夺”。^{[2](卷宗30)}陆征祥得函后随即将美国总统罗斯福1933年的就职誓词以中、英、法三种文字重印，并分赠各界人士。罗斯福在该誓词中引用《新约圣经》中保禄致格林多人书信的内容，一再强调仁爱主义。陆征祥希望“凡近世领袖人物以聚敛、扩军、杀人、拓土为正当职责者，皆宜手持此篇而三复之也”，落款时间也特意署为“中华民国廿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启衅日”。^{[2](卷宗63)}

陆征祥批判之目标虽然集中于日本侵华，但并未局限于此，而是放眼于普世人类的和平。在他看来，当时非独中国面临兵燹之灾，整个世界均陷于无休止之纷争。究其根源，则在于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七七事变”两周年之际，他依据天主教之博爱精神，做《爱国论》（《新南星》第五卷，1939,9）劝谕世人：

“国有祖国天国之称，爱国有人性超性之别；爱祖国者人性也，爱天国者超性也。超性包含天性，使人格高尚，使生活于百善之中，个人祖国两受其益；人性脱离超性，使人格低落，使生活于万恶之中，个人祖国两蒙其害。现在世界各国，提倡爱国，爱祖国于万有之上，西文：Patriotisme；故祖国，乃独一无二之至尊者，甚至拓土杀人，曰：此为祖国也，正当之行为也；毒害人种，亦曰：此为祖国也，正当之行为也；侵夺人利，不顾公理，亦曰：此为祖国也，正当之行为也……凡此爱国分子，日生活于万恶之中而不自知，反以爱国自傲，其人格之低落，为人所不齿，岂非个人祖国两蒙其害乎？公教提倡爱国也，则不如是，爱祖国而兼爱天国，以超性之爱，包人性之爱，其爱何如？曰：邻邦遇衰落不振之际，尽力扶助，以复兴之；曰：邻邦遭饥荒疾疫之祸，节食施医，以赈济之；曰：邻邦被人侮辱侵略，或整旅往助，或遣使调查，据理力争而判断之……凡此爱国分子，以高尚之人格，维持公道正义，保卫人类文化为职责，日生活于百善之中，为世界民众所崇拜，彼既爱本身祖国，兼爱他人祖国，以彼此祖国做平等之爱慕，而以天国为独一无二之至尊者，如此，岂非个人祖国两受其益乎？爱国美名也，而爱国之道，各有不同，孰得孰失，孰去孰从？愿世人自择之！”

陆征祥崇尚“仁和”理念，坚持和平至上主义，企望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使人类免受战祸之苦。但“铁血摧公理”的残酷现实，使他不得不承认国际间并无公义，转而寻求“超性之爱”。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固然高尚，却在日益甚嚣尘上的“国与国之间没有友谊，只有利益”的悖论中变得虚无缥缈。他后来意识到只有刚柔并用，以战促和，方能最终结束战祸。

三、抗战宣传：《中华公教呼声》与《〈益世报〉海外通讯》

1938年，La Voix de l'Église en Chine（《中华公教呼声》）在比利时出版。该书汇集了教廷驻华代表蔡宁、上海主教惠济良以及于斌等人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和观点，向各国民众表达了中国天主教会领袖对世界和平的殷切期望，陆征祥为之作序。他在序言中指出，自1931年以来，日本为一己之私，公然践踏国际法，违背国际条约，对华实施野蛮侵略，企图在中国建立永久军事控制。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以及对其它北部省份的侵袭，虽使中国人民饱受苦楚，却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日本现在扩大对华战争，是中国政府、社会和人民果断作出决定的时候了。中国教会领袖遵循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国事遗嘱，以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为己任。《自由比利时报》（La Libre Belgique）、《列日捷报》（La Gazette de Liège）等报纸介绍了该书。它随即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以及世界语在伦敦、罗马等地出版。中国教会领袖团结抗战的形象，使国内、国际人士均对中国必胜充满信心。

是时日本政府及军方非常重视国际宣传，对外宣称其过去之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履行维护东亚和平的使命。其现今在华采取军事行动之目的，亦为剿灭盗匪及共产党人，维持远东秩序与社会正义。事实上，日本所谓之“秩序”即确立其在远东的霸权。而当时欧洲多数报刊均大量采用日本官方新闻电稿，

儿成为日本陆军部之传声筒，严重误导国际舆论。伪“满洲国”成立后，英法企业家分别派团前往考察；比利时著名亲日派、驻日本大使德·白松皮尔男爵亦在比国报纸上撰文，鼓吹比国工商企业家去东北考察，实际上是为进一步承认伪满铺平道路。鉴于此，天津《益世报》创办人、已加入中国籍的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Vincent Lebbe）与于斌商议，拟在比国出版法文月刊Le Correspondant Chinois（《益世报》海外通讯），向欧洲民众披露远东事件之真相，以遏制日本在欧洲的宣传攻势，试图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迫使日本停战修和。他们决计将此重任委托于时在布鲁日隐修的陆征祥。1939年1月，于斌抵达圣安德肋修院，与陆征祥商谈《益世报》海外通讯出版事宜。经短暂筹备，2月4日该刊在布鲁塞尔正式出版，总管理处与编辑部设于昆明，秘书处设于布鲁塞尔，由陆征祥的秘书爱德华神父（E-douard Neut）负实际管理之责，另于巴黎设办事处。

《益世报》海外通讯为第一份在国外出版的中国报纸副刊，它秉承《益世报》之传统，以天主教教义为指引，既揭露日军在中国占领区之种种暴行，报导华夏儿女之浴血抵抗行动及现时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亦登载世界各国人士对中日冲突与世界和平的看法。陆征祥希望该刊“像欧美所有报刊一样，既可见于各国政要、社会名流、上流社会妇女以及职业女性之案头，亦可见于汽车司机、马车夫、小商贩、工厂工人等卑微者之手”。^[5]（N° 2, mars 1939, P26）发行之初即向欧美政要、关心中国的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寄赠。

陆征祥年届70高龄，体弱多病，书写不便，仍以Moline或Mo Lin的笔名（从第2期起用中文加署“木兰”），以“一群中国年轻女性”的名义，坚持为该刊撰写“中国妇女通讯”。通讯的内容主要有四点。

（一）揭露日本侵略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损害以及中国民众所承受的巨大灾难。“木兰”指出，民国建立以来，中国民众在借鉴其它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力图赢回已失去的时间，实现中国的复兴。但日本的侵略不仅使中国陷于血腥的战争之中，而且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5]他向欧美姐妹们描述了南京、汉口、重庆等城市遭受日军轰炸之后尸横街头、伤亡遍地的惨状，指出当前人类历史已濒危局，恶势力之膨胀，已危害各民族数世纪以来承继自其先祖之文化与文明。故中国既为自我生存而战，同时亦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战，以保存此种文明与文化。

（二）向欧美女界诉说中国妇女在战争中亲历的苦痛，凸显她们决志保卫祖国的使命感以及舍生忘死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坦诚地告诉你们，经过近20个月的战争，我们已与祖国心心相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了敌人的威胁。它要掠取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中国的年轻女性已经觉醒。”“在军队后方，在医院，我们那些年轻的护士和护理员姐妹们致力于照顾伤者、病号、难民、孩童、妇女以及老人。”^[5]（N° 3, avril 1939, P41-42）

（三）将中国与1914—1918年的比利时相较，以便欧美女界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当时所处的困境。他将蒋介石和宋美龄比作中国的亚尔培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宣扬蒋、宋的爱国言论及其抗战活动，向欧洲妇女详细介绍蒋、宋所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以及中国文化中的“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并将之与福音精神相比较。

（四）希望通过建立通讯联系，与比利时及其它西方强国的女性们在思想上更紧密的联合起来，并呼吁她们深切关注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他号召西方姐妹们抵制日货，劝告她们“不要间接地帮助日本空军杀害我们。你们为孩子买日本玩具所付出的钱，会变成上千上万的炸弹落在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我们的小孩子身上——这些幼小无辜的生命尚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受到如此残酷的对待”。^[5]（N° 6, juillet 1939, P96）同时他满怀期望地邀请西方国家妇女来华服务。

该报的宣传在法国、比利时等法语国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逐渐改变了法语国家人民对于中国抗战事业的态度，为获取国际援助和促进中西人民友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该报的影响下，安特卫普《都市报》（La Métropole）开辟专栏报导中国抗战事业并为中国人民的观点辩护，其它报纸也纷纷转发《益世报》海外通讯的有关报导或向该报索取关于中国的信息。^[6]（P2-3）比利时中国友爱会（Amitiés Chinoises de Belgique）、该国主教、青年工人乃至学生均响应《益世报》海外通讯的呼吁，或发表通电抗

议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或向陷于兵燹之灾的中国孤儿及战争受害者捐款，支援中国军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正义之举。甚至有比利时青年愿意充当志愿军，参加中国抗战事业。^[2](卷宗60,61)]一些比利时友好人士也与该国红十字会合作，成立“比利时援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委员会”(Comité Belge de Secours aux Victimes de la Guerre en Chine)，两年之内即募得善款664047.25比郎，主要资助上海慈安产科医院和慈惠医院，并为妇女儿童提供避难所。陆征祥本人亦将300份Le Soir Illustré画报上所刊登的有关他的报道以及2000份比利时国王亚尔培致其亲笔信的复制件分赠友人，希望他们能提供资助，建立一间专为穷人服务的小医院。1940年初，在自身医药费尚无着落的情况下，陆征祥仍捐献救国公债票110元。^[2](卷宗47)]

除向国际社会呼吁外，陆征祥亦将中国传统的忠孝之道与天主教“孝敬父母”之诫命相结合，鼓励同胞在国难时“移孝作忠”，以孝敬父母之心报效国家：“小兄……心里盼望国人都做孝子。在战场必忠勇，在政府必尽职，在社会必正派，在家庭必尽本分。虽有强邻xx，我亦何惧哉！”^[3](P298)]他勉励华侨杨峻林等人“效法大舜，以光祖邦”。^[2](卷宗57)]他认为，在国难期间，“振兴教育实为救国要图”，期望海外侨胞能共襄盛举，资助辅仁大学，支持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2](卷宗44)]与此同时，他个人出资印制大量明信片，配以中、英、法文说明，在海外华侨及国内友人中广为散发，藉以相互砥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马相伯所书“还我河山”；著名画家张善子（张大千之兄，人称“虎痴”）所作“五虎扑山图”并附民族正气诗“汉家飞将雄，直扫倭虏穴；恢复旧神州，四海歌英烈”；无名氏所作“中华睡狮猛醒”等。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出，陆征祥欣然欢庆国运之否极泰来。他为战争的结束而欢欣鼓舞，特题“公理战胜强权，铸剑戟为农器”以为纪念，^[2](卷宗30)]并请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金问泗代其致电重庆《大公报》：“神州恢复，代表全国献祭谢恩。”^[2](卷宗60)]

四、余论

拿破仑曾言“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陆征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以笔为枪，扞伐日本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呼唤正义与公理，既展示了自己的爱国精神与人文关怀，也为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和物质援助、增强祖国民众抗战到底与抗战必胜的信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外交部长王宠惠函赞“台端阐扬公教，倡导和平，远隔瀛壖，不忘祖国，行见外患胥战，真理弥明，仁言利溥，曷胜景佩”。^[2](卷宗46)]驻美大使顾维钧亦赞其“关怀祖国，虔祷和平，悲天悯人，慈光博大，曷胜钦仰”。^[2](无编号)]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在呈外交部函中，称许陆征祥“关怀国事，一如曩昔。抗战以来，致力于国际宣传，不遗余力，深赖协助”。^[2](卷宗47)]古巴侨报《华文商报》誉“陆征祥爱国不后人”，认为其宣传之功效“实不能以等闲看也”。^[7]外报称“作为本笃会隐修士，陆继续为他的同胞服务。没有人比他更尽心尽力地了解和热爱中国”；^[8]他是“苦难中国的伟大捍卫者”。^[9]

毋庸讳言，在抗战救国的洪流中，陆征祥之言行无异于沧海一粟。但邱首不忘故国，丹心一片难忘。斯人已逝，其拳拳爱国之心与赤诚精神却生生不灭，永存于世。

【参考文献】

- [1] 磐石杂志（第二卷）. 1934, (5).
- [2] 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肋修院（Sint-Andriesabdij, Zevenkerken, Brugge, België）藏陆征祥档案.
- [3] 罗光著，苏雪林、刘鸿逊校订. 陆征祥传 [M]. 香港：真理学会，1949.
- [4] 陆征祥致刘符诚书信选 [Z].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编（第33辑）[Z].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 [5] Le Correspondant Chinois, N°2, mars 1939.
- [6] Le Correspondant Chinois, Rapport Général, Première Année, févr.-oct. 1939.
- [7] 陆征祥爱国不后人 [N]. 华文商报，1938-09-21.
- [8] Georges-Marie Matthijs, Dom Lou, La pensée chinoise et la rencontre des humanités. Le Tchessich, 3 septembre 1949.
- [9] Souvenirs et Pensées. Le Journal de Bruges, 25 février 1945.

责任编辑：杨向艳

陆征祥晚年的爱国情怀

作者: [陈志雄, Chen Zhixiong](#)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历史系](#)
刊名: [学术研究](#) PKU CSSCI
英文刊名: [ACADEMIC RESEARCH](#)
年, 卷(期): 2006, "" (4)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6条)

1. [查看详情](#) 1934(05)
2. [罗光, 苏雪林, 刘鸿逊, 陆征祥传](#) 1949
3. [陆征祥致刘符诚书信选](#) 1988
4. [陆征祥爱国不后人](#) 1938
5. [Georges-Marie Matthijs, Dom Lou La pensée chinoise et la rencontre des humanités](#) 1949
6. [Souvenirs et Pensées](#) 1945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syj200604020.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60d4d5dd-4741-4682-bc3b-9e4d008fa63d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